

鲁迅论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出版社

参加本书编选工作的有李万钧、
姚春树、陈钟英；最后由郑松生、温
祖荫审改、增补、定稿。

鲁迅论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 \frac{3}{4}$ 插页 2

1982年6月北京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书号 10208·97

定价 1.55 元

向鲁迅学习（代序）

茅 盾

一

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是多得惊人的。在这样繁重的介绍工作中，鲁迅表现了始终一贯的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明确的政治目的性。

鲁迅的介绍、翻译外国文学的活动，开始于他在日本留学的时期。“风雨如磐暗故园”，那时清王朝以及当权的洋务派崇洋媚外，出卖国家主权；以振兴实业，引进西洋科技知识为名，实际上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又为中国第一代的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成长，准备了温床。洋务派又以“中国国粹”的卫道者自居，打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招牌，推行野蛮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他们顽固地鼓吹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的一切糟粕，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妄图借此铜蔽人民的思想，禁止人民任何反抗封建礼教、封建秩序的言行。

与此同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主张武

力推翻清王朝，建立“五族共和”的民主共和国；他们不但对卖国丧权的清王朝进行了多次的武装起义，也同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派进行了大论战。保皇派主张君主立宪，但立宪是假的，保皇是真的，他们是投降派。鲁迅在政治上属于革命派，但他主要是从介绍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方面参加了对洋务派和保皇派的斗争。而这个思想意识领域的重要性却正是当时革命派所忽略了的。

二

一九〇七年前后，鲁迅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投入革命派对洋务派和保皇派的大论战。其中《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是反映他这时期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代表性著作。

《文化偏至论》简要地叙述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以后直至所谓世纪末的各种混乱、颓废思潮，而结论为：今所注重者，“止于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他所谓“非物质”即是“反对偏重物质文明”；所谓“重个人”即是“要求思想解放”。鲁迅在此文中痛论的“西方物质文明的流弊”，即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阶级斗争的激化，帝国主义列强间激烈争夺势力范围，以至爆发了多次的武装冲突。由于时代的限制，鲁迅当时论述十九世纪后期的欧洲思潮时，还看不到这些混乱、颓废思潮的社会根源，也没有提到指引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是笼统地认为这是偏重物质文明的

流弊。又因为他强烈要求思想解放（这在“五四”运动时才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正式提上日程），以至只看到尼采超人哲学的“偶像破坏”的一面，而忽略其极其反动的一面。然就其主要者而言，《文化偏至论》所提出的问题在当时是一声惊雷，可惜这雷声在旷野中自行消失了。鲁迅在论文结尾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搞丧且不俟夫一世。”此所谓“立人”即现在所谓“人民的觉悟”。鲁迅这结论作于七十年前，在当时是少见的，几乎是惟一的有远见的呼声。

《摩罗诗力说》象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一样，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运输了革命的精神食粮。

《摩罗诗力说》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文艺思想，热烈歌颂了代表这种文艺思想的若干“立意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叛逆诗人（摩罗诗人，恶魔诗人），如拜伦、裴多菲、密茨凯维支等等。鲁迅当时没有可能翻译这些诗人的充满着火焰般叛逆精神的作品，而只能介绍他们的作品的内容以及他们的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甚至帮助别的被奴役的民族），不畏艰险，以身殉之的英雄气概。这在当时，起了鼓舞革命派的士气的作用。

同一时期，鲁迅又翻译并印行了《域外小说集》。这个短篇小说集是继续《摩罗诗力说》的主旨，介绍俄国、北欧、波兰等国的反映人民痛苦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这是第一次把反映被压迫的人民和被奴役的民族的叛逆和反抗的作

品，介绍到中国。其用意和《摩罗诗力说》是相同的。

三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域外小说集》在当时是旷野的呼声；此后十年间，世界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而且由于中国本身的社会矛盾在激化，阶级斗争在发展，爆发了震撼中国社会的“五四”运动，并接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鲁迅属于“五四”运动的左派。他十年前提出的要求人们思想解放，扫荡一切锢蔽人们耳目的旧传统、旧文化，和被压迫人民与被奴役民族都得到解放的革命呼声，在这时候不再是旷野的呼声而引起了千百万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

在这时期，鲁迅翻译、介绍世界进步的文学，其数量也比过去多得多了。重点仍在反映被压迫人民和被奴役民族的痛苦和斗争。十年前，《域外小说集》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各只卖出了二十册，现在，范围扩大而数量增多的新译的世界进步文学作品的读者，就不是以千计，以万计，而应该以十万计了，其影响之深远是空前的。

鲁迅当时主张文学应当“为人生”。他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他当时翻译介绍的安特莱夫和阿尔志跋绥夫就是两个“堕入神秘，沦于颓唐”

的作家。鲁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批判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悲观厌世思想，指出这些作品的可取之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沙俄社会的黑暗现实，而且其中“许多事情竟和中国很相象”。因此，翻译这些作品，也意在由彼及此，揭露那时中国反动统治者（北洋军阀）及其帮闲文人对于改革者的迫害。鲁迅那时以为首要之务是唤醒人民，使其知道病根何在，至于用什么药方，应由人民自己选择。

那时鲁迅的翻译中还有不少童话，其中就有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一部童话集和一部童话剧。爱罗先珂并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诗人，是在一九二一年他被日本政府驱逐出日本之后，鲁迅这才“留心到这位漂泊的失明的诗人”。爱罗先珂被日本政府放逐时，还遭到了“辱骂与殴打”。鲁迅说，“如一切被打的人们往往遗下物件或鲜血一样，爱罗先珂也遗下东西来，这是他的童话集”。（《〈狭的笼〉译者附记》）鲁迅认为爱罗先珂的童话“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天心”。（《〈池边〉译者附记》）正因为爱罗先珂的童话表现有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鲁迅所以热情地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

鲁迅此时还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鲁迅并不是全部赞成这两个人的论点，而只是以为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因为这些书中所揭露的日本思想界的矛盾、腐化与无所作为，“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

鲁迅还译过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

厨川白村根据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鲁迅翻译时，还没有识破这种唯心主义理论的荒谬性。

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日益高涨，导致了北伐战争初期的伟大胜利，然而即在此时，作为“五四”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转向反动。这使鲁迅思想产生了矛盾的波澜，他感觉到自己原来掌握的进化论等旧的思想武器日益显得不能适应新的斗争要求，而新的阶级力量又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徬徨求索的矛盾心情反映在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中，就象上面简单叙说的那样，他所翻译介绍的作品中的消极成分或者未能进行批判，或者虽然批判了而不够有力。

四

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代表大地主买办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投降帝国主义而出卖革命，而血腥屠杀当年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员，鲁迅是目睹的，是万分愤慨的。当其时，同是青年而或者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卖友求荣；或者慷慨就义，宁死不屈，鲁迅也是目睹，是万分愤慨的。这些血的教训，最终轰毁了他多年来据以观察、分析事物的进化论思想，转而求索那解决人类命运的普遍真理，他开始阅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本来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目标，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战斗纲领是一致的；他的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革命、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鲁迅思想中这一主导力量，决定了他的思想中的进化论思想和唯心主义成分必然会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被克服。果然，在一九二六年以后，短短数年内，鲁迅通过勤奋的学习和英勇的斗争实践，终于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飞跃。

由于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鲁迅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一贯的，坚定的。而在他弄通并掌握了马列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的过程中，他又锐敏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将决定共产党的未来，亦即中国革命的未来。虽然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可是他对党内的路线斗争已能辨明其方向，而自觉地坚决拥护正确的一边，这表现为他对领导正确路线的毛主席的信任与热爱。

一九二八年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关于革命文学的激烈争论，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急待依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作出科学的论断，以便澄清思想上的混乱。那年八月，鲁迅曾在回答一个读者的信中说：“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这里，鲁迅提出“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意思是，

如果要对唯物史观有真正的理解，化为自己的思想的血肉，则除了钻研正面教材以外，还得阅读反面教材。而在那时，一些自称唯物史观的评论家其实连正面教材也没有看过原版，只从一些稗贩者手里间接弄来了若干公式。因此，鲁迅要求有“切实的人”认真做运输精神食粮的工作。这个工作，鲁迅不久就自己来动手做了。

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以及日本人辑译的《文艺政策》（这是根据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召开的关于文艺的党的政策讨论会的记录等材料编译的）。这几部书，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和十月革命后俄国文艺界的论争和结论等等，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虽然其中并非完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这无疑有助于解决我国当时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并推进革命文艺的健康发展。

鲁迅又热情地翻译、介绍了反映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的作品。他自己翻译了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并为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曹靖华译）的出版，费尽了心血。他赞扬这两部小说写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在当时中国的革命斗争中也充满着“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因而这两部小说的翻译，不但鼓舞了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浴血战斗的革命群众的士气，也使广大读者从书本联系到自己国家的现实，坚定了对革命的信仰。

此外，鲁迅又翻译了高尔基的作品以及沙俄时代批判

现实主义的作品，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等。同时他和从前一样，热情于介绍、翻译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文学作品。鲁迅介绍那些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和民族英勇地求解放的作品，不光是出于同情，而是因为它们“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和它们的“境遇”相当近似，不但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而且都有长期坚决反抗的历史，读了这些作品，易于“心心相印”，互相支持，互相鼓舞。这就把翻译、介绍被压迫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作品的工作，提到了全球性的革命战略的高度。在这里，鲁迅的翻译、介绍工作，是紧密地配合了各个时期中国革命的需要。

鲁迅不把翻译方法看作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提高到政治斗争和原则问题来处理的。

鲁迅认为翻译必须忠实于原作，而且主张在“信”、“达”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宁信而不达”。当时御用文人梁实秋之流诬蔑鲁迅的翻译是“死译”、“硬译”，其背后的阴险用心在于堵塞、摧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革命文学作品的传播。鲁迅对此给以迎头痛击，指出这不是个翻译方法问题，而是由哪个阶级来占领翻译阵地的问题，亦即运输精神食粮的渠道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他说：他们妄图使人民群众在法西斯的愚民政策下，“由聋而哑”，任其宰割，“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鲁迅就是这样把翻译工作看成是粉碎反动派的愚民政策，激发人民革命情绪的重要手段。

鲁迅称忠于原作的翻译方法为“直译”，梁实秋之流却诬蔑为“死译”、“硬译”。这里实质上就是在翻译方法上反映了阶级斗争。反动派文人当时自夸为“达”而“雅”的译品其实是歪曲原作，使之面目皆非，以便达到其“说真方、卖假药”的罪恶目的。鲁迅为了揭露他们的卑劣手段，不但提出“直译”这一正确主张，而且提出了必须有“复译”这一在当时绝对必要的主张。在当时，出版商和资产阶级文人都视译品为商品的情况下，粗制滥造的译品泛滥市场，复译的必要性也就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而不仅是忠于原文的问题了。

鲁迅当时也极力支持转译（重译），这也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惟有转译才能迅速传布马列主义及其文艺理论，才能使中国读者看到被压迫人民、被奴役民族以及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

以上的叙述，十分粗糙、简略，也不免有错误，但是大体上可以看出：在鲁迅战斗生活的最后十年中，贯穿于其早期工作中的高度革命责任感和明确的政治目的性，逐步加强而发展了。

这是我们在外国文学工作中首先要向鲁迅学习的。

鲁迅对于中外古今的文学遗产，从不采取片面的极端的态度。他是辩证地看待它们的；他主张吸取其精华，化为自己的血肉，主张借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反对夸大一点以概括全面，也反对因有小疵而抹杀其基本上的有益部分。他强烈抨击那些抱残守缺、锢蔽耳目的所谓“国粹”，

但他也竭力主张中国五千年封建文化的精华应当继承而发展，而使古为今用。他猛烈抨击当时所谓“全盘西化”的谬论，并斥之为洋奴思想。但他对于西方文化、文学的优良部分，便热情地翻译和介绍。他努力于介绍欧洲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反映被压迫人民、民族的文学，但他也重视欧洲古典文学（指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学），认为可以借鉴，应当吸收其血肉以滋补我们自己而弃其皮毛。他主张文学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他反对文学评论中的“一言堂”，反对宗派主义。认为这样才不会故步自封，才可以创造生气勃勃的新局面，这就暗合了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我们在介绍世界文学工作方面向鲁迅学习，我以为就应当学习这些。

当然，首先要学习并真正弄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后我们的学习鲁迅才不是皮毛，我们的介绍世界文学的工作才不会流于形式主义。

五

反党集团“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霸占了文艺阵地，疯狂地篡改了毛主席的光辉的文艺思想。对待外国文学的介绍，他们推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叛徒江青公然吹捧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大加宣扬的《飘》一流的作品，而对于还有进步意义的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

文学作品却横加诬蔑、歪曲；对高尔基的作品以及苏联十月革命后表现无产阶级战斗精神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入冷宫。他们打着拥护鲁迅的旗号，实际上干着歪曲鲁迅、攻击鲁迅的阴险勾当。他们妄图复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抄袭了当年鲁迅所痛斥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使人民大众“由聋而哑”的文化专制主义。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文艺园地开始呈现一片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四人帮”的流毒尚待继续肃清，在介绍世界文学方面，也是如此。为了做好介绍世界文学的工作，就必须继续认真学习并弄通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其它有关文艺的指示，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总结和发展，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宝库。掌握了这个威力无限的思想武器，才能使介绍世界文学的工作，真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尽其运输精神食粮的任务。在这一点上，介绍世界文学的工作就和肃清“四人帮”余毒的工作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了。任务是艰巨的，前途是光明的。毛主席光辉的文艺思想在引导着世界文学介绍工作者前进！

一九七七年七月八日写完

目 录

向鲁迅学习(代序)	茅 盾 1
-----------------	-------

第一部分 总论

一、介绍外国文学的目的、方法及重要意义	3
1. 输入外国文学, 改造国民社会, 促进中国革命	3
2. 必须大胆地、无畏地借鉴外国文艺, 才能发展 中国的新文艺	6
3. 要忠实于原著, 要分析, 比较, 写序言	15
二、自述外国文学对自己思想和创作的影响	17
三、俄国和苏联文学	24
1. 俄国文学	24
2. 苏联无产阶级文学	26
3. 关于苏联文艺论战	26
4. “同路人”文学	29
四、外国文学的翻译	34
1. 目的在于促进世界文化交流	34
2. 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	35
3. 翻译的路要放宽, 批评的工作要着重	38
4. 反对节译、误译及“宁顺而不信”的乱译	42
5. 关于“直译”、“意译”、“重译”和“复译”	48

6. 支持翻译界的新生力量	57
五、外语学习	62

第二部分 论外国作家作品

一、俄国 苏联	67
1. 普希金	67
2. 莱蒙托夫	69
3. 果戈理	72
4. 冈察洛夫	82
5. 屠格涅夫	82
6.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	83
7. 陀思妥耶夫斯基	84
8. 萨尔蒂科夫 - 谢德林	89
9. 列夫·托尔斯泰	90
10. 柯罗连科	102
11. 迦尔洵	103
12. 契诃夫	105
13. 梭罗古勃	110
14. 契里珂夫	112
15. 安德列夫	113
16. 阿尔志跋绥夫	117
17. 勃洛克	128
18. 叶赛宁、梭波里	131
19. 普列汉诺夫	134
20. 绥拉菲摩维支	141
21. 高尔基	143

22. 卢那察尔斯基	151
23. 诺维科夫 - 普里波依	168
24. 别德内依	168
25. 革拉特珂夫	169
26. 略悉珂	170
27. 札弥亚丁	171
28. 聂维洛夫	172
29. 雅柯夫列夫	174
30. 玛拉式庚	178
31. 爱罗先珂	180
32. 谢芙琳娜	187
33. 英培尔	188
34. 富曼诺夫	189
35. 左祝黎	192
36. 拉甫列涅夫	193
37. 理定	195
38. 毕力涅克	197
39. 伊凡诺夫	202
40. 潘菲洛夫	203
41. 伊连珂夫	204
42. 卡达耶夫	205
43. 里培进斯基	206
44. 法捷耶夫	206
45. 伦支	217
46. 盖达尔	219
47. 班台莱耶夫	220